■新作聚焦

徐世立纪实文学《一个孩子的战争——家庭拯救纪实》

反思现代社会教育的诚实之作

□林 雨

徐世立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一个孩子的战争》我是在忐忑中读完的。这份忐忑固然是由于作者善于掌控叙事节奏不时留下点悬念造成的，还由于一份对作为父亲的作者的担忧。

市面上如今有众多的关于孩子成长教育的励志类读物，颇有点家庭教育成功学教材的意味，其中不乏发行量上百万的作品，这类读物也常常登上各大图书排行榜。仔细比对一下会发现，《一个孩子的战争》与它们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如果说那些读物展现的是一个个成功及如何走向成功的教育案例的话，那么，《一个孩子的战争》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是对一个不那么成功甚至可以说是教育失败案例的解剖。失败既指孩子成长中的曲折，当然也包含了父母及学校、社会对孩子成长的力所不及。一个从小品学兼优获得很多荣誉的孩子，是如何变成高中时学校老师和父母眼中的问题学生、问题孩子的？更为重要的是，家长、老师们又是如何来破解这一难题的？作品诚实地把一个家庭面对这个难题时的困惑、痛苦、崩溃、挣扎袒露了出来，孩子的痛苦，父母的痛苦，都在作者没有掩饰、没有修饰的笔墨下一一呈现。

徐修远打小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优秀聪明的孩子。“整个小学阶段他都出类拔萃。他几乎每年每学期都是三好生，作文、英语多次在省、市、区比赛中获奖。他酷爱运动和艺术，乒乓球、篮球、游泳、自行车、象棋、绘画、声乐、舞蹈、钢琴，无所不会”，“曾获得武昌区‘艺术小人才’一等奖和‘雏鹰少年’称号，还被武汉团市委和武汉市少工委授予‘雏鹰勋章’”。这是一个父亲对孩子有些痛心、有些得意的素描。在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何等优秀的孩子，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出，这样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他的时间安排上是何等的“充实”和“忙碌”。有一则新闻说，“六一”的时候，有四成父母给孩子送的礼物都没送对，花大价钱却卖回了小伤心，结果是孩子不领情，父母徒伤心。新闻说，孩子“六一”最想要的礼物，是自由。就是这样一个被送上成功学跑道的孩子，在父母的记忆中，从初二下学期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偏离了“成功”的跑道，起因是孩子要买电脑。作为旁观者而言，对于父亲笔下孩子的“堕落”始于电脑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也说明了作者这一辈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孩子父母的“典型性”局限和伤痛。在父母的忙碌、忧伤、痛苦中，孩子终于成为了本书开篇父母亲短信中说的那样：这小孩完了。

吸引我一口气读完该书的重要原因，不仅仅是这个孩子令人揪心的成长经历，更是作者徐世立袒露自己身心伤痕引起世人警醒的可贵勇气和责任感。一个家庭出现了一个不容于社会、学校的问题孩子，是父母最深的伤口，多少不足为外人道的忧惧、伤心和失望，都只能关起门来自己消化、自己痛苦，这是中国人面子下面的里子，不管里子如何千疮百孔，面子是不能不要不能不光鲜的。然而，徐世立撕破了自己家庭的面子，敲响了他的警世钟。从他和孩子关于电脑、关于PSP的几个回合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痛苦而愤怒的孩子，也看到了一个痛苦而愤怒的父亲，看到了一对缺乏沟通、交流和理解而关系越来越陷入僵局的父子。徐世立勇敢地把自己的痛苦、自己当时的慌乱无措展现了出来，读者可以批评这样一个父亲在如何做父亲上的欠缺和不足，却不能不被他对孩子的热爱和坦诚而感动。等到走投无路的父母发现了徐向洋的教育训练工作室，决定把孩子送去工作室在湖北宜昌的三峡纵队时，这一场“一个孩子的战争”也进入了最为激烈的时候。从决定送孩子去三峡纵队，到真的实施这个计划，这一对父母愁肠百结，百回千转，一对走投无路的父母的忧愁和痛苦如此真切而揪心地打动着读者，与其说是作品文字叙述的力量打动了读者，不如说是坦诚不矫饰的情感和痛苦打动了读者，这的确是一个切入现实、对现实发问的优秀作品所具有的力量。当下大量作品，尤其一些励志类作品，通篇可见的是写作者立足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让位于现实、务实、识时务同构的价值取向，趋利的成功学准则遮蔽了文学创作应有的可贵的批判、反思精神，一些这类题材的纪实作品，更将现实主义等同于对一个现实的原生态再现。现实主义精神绝不是简单的描摹现实，而是立足于现实的思考并发问，发出自己负责任的声音。本书的价值恰恰也在于此，作者“残酷”地解剖了自己，裸呈自己和家庭的病灶，因此，《一个孩子的战争》更可以说是一个父亲的忏悔录，一个父亲的思痛录。

从文学和社会学层面而言，《一个孩子的战争》远远不是一个完美的文本。作者在本书结构上采用了书信、议论、描述、采访实录、学生作文等多种形式多角度开掘，拓展了写作的视域，但在反思的针对性上仍嫌力度不够。而被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学熏陶出来的父母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维，依然在左右着作者的写作，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困扰着作者这部作品的写作。已故数学家陈省身应邀去某高校演讲，送给了该校学子（都是过独木桥的千军万马中出类拔萃者）一句话：不要考一百分。意思是不要紧盯分数和课堂上的排名，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思考和发现上。《一个孩子的战争》以孩子经历三纵106天的特训日子后确立考大学的目标，最后考上中戏作为这场战争的结束。在父亲的思路里，孩子最后是“成功”了，突击考上了自己想去的大学，但在读者看来，这样的结尾却是“不成功”的，反思来反思去还是走上了旧有的思维轨道。笔者曾经对作者说，看完作品，发现有问题的不是孩子，而正是作者本人。仅从文本上看，在这场战争中，孩子拒绝上学、拒绝早起、拒绝校服、拒绝考试，但是却从来没有拒绝过学习，拒绝过思考。尤其在三峡纵队写下的6万字“工作室随记”，里面有对于与父母间“战争”的思考，有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思考和反问，有对自己成长历程的反思，有对工作室择差教育的认识和反思，当然，也包括很多的困惑和混沌，充分体现了这一代孩子（90后）相对完备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读完作品可以发现，引发这场“战争”的关键，不是在于孩子不好，也不是父母不尽心尽力，而是在于孩子和父母之间严重欠缺沟通和交流，严重缺乏对一个孩子精神思想自由的尊重和关切。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作者，不完美的文本，却是一个诚实的作者，一个诚实的文本，作者去虚妄不矫饰的态度，诚实地再现了现代家庭社会教育思维的病态和症候。

当下社会与文学，务实者多，却不一定诚实。老老实实观察、思考者日渐稀少。笔者曾和作者交流，感叹当今老实人、诚实人越来越少。《一个孩子的战争》的写作对徐世立而言是一场痛苦而惨烈的折磨，也是一个父亲涅槃的过程。正如书名中所示：家庭拯救。该被拯救的是谁？是孩子？是父母？是老师？还是现代社会教育的林林总总？于该书作者而言，显在的拯救显然是针对孩子的，真正被拯救的却是孩子的父母，而更应该被拯救的是谁？笔力所指，显然是当下的社会教育生态环境。这样一个文本，因为问题的真实呈现和解剖而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当前的纪实文学作品，表扬稿不少（当然也是需要），滑向历史自斟自饮的不少（仍然是需要），急于表明自己态度的批判稿不少，甚至有人以此为荣，认为这就是责任，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了，其实仍然是个人的表演。真正的责任和使命是需要接地气的，需要及物的，需要建立在脚踏实地的现实和思考上的，甚至是实实在在的困惑之上的，反之，无论哪种写法，都容易走向空洞，走向虚空，都容易写飘了，写作到最后，也就变成了一次个人的表演。这样的作品，无论打出何种旗号，于读者、于文学、于社会实质上是一样的空洞无益处。《一个孩子的战争》有着问题小说的影子，是中国文学重要传统的延续。问题文学，无论哪个时代，都是需要的。只是如今越来越不被人重视甚或记起了。

悼周汝昌先生

□范 曾

五月三十一日晚，惊悉周汝昌先生谢世，悲不能胜，口占一律，为学界哭。

疾雨初停地忽移，
唐槐折幹恍遥知。
惊闻已谢人间世，
不信能抛石上思。
大隐当欣无雀噪，
嵩文早自衬凰曦。
而今旷宇唯孤唱，
一去诗贤和者迟。

六月一日凌晨四时于抱冲斋

■创作谈

不让儿辈成新鬼

□徐世立

作为一个50年代出生的父亲，我没想到自己的“90后”儿子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问题学生”、“差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和有着一颗慈悲心的妻子联手，将独生儿子变相劫持到社会俗称的“魔鬼训练营”，去经受身心的磨难、人生的“黑暗”，更没想到经历了106天“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磨炼后，儿子年轻的生命还会继续恶化到崩溃的边缘……

无数个“没想到”，无数个措手不及。我和妻子，父母和儿子，似乎骤然间被卷入中国那个庞大的“问题家庭”群体——5000万，甚至逾亿，身不由己、晕头转向、茫然无助。

“问题孩子”、“择差教育”（现已改为“特别教育”），这些于我全然陌生的词语迎面而来，猝不及防。“河里无鱼市上见”——直至进入“特别教育”学校，直至在“精神治疗中心”住院50天，我才看到了社会一隅的真相，原来有那么多的孩子和家长正在过着那么悲惨的生活。原先以为因“一个孩子”而引发的战争，只是在我们或个别家庭中发生，却原来正在千千万万个家庭中“上演”，不是有或没有，只是激烈程度不等，比我们残酷甚之者广，惨烈过之者众。

这么多孩子被排斥在主流的“择优教育”之外，他们小小年纪就成了“问题”——自身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这些孩子、这些学生被边缘化了，没有谁关注他们，没有谁走近他们，教育失却了公平，人心缺失了正义。孩子面临或拯救或沉沦的命运，他们比家长更无助。

当然是要拯救。可是，谁来拯救？如何拯救？需要拯救的难道仅仅是孩子？难道应该由孩子承担“问题”的责任、吞食“问题”的恶果？为什么“问题孩子”、“问题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为什么至今还有人对“特别教育”一知半解、一叶障目或是全然的盲区？为什么“特别教育”学校的“生活教育”理念至今不被主流的教育体制接纳，并使此类民间教育机构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生死边缘？这样一路追问下去，会形成一个连环追问链，我竟然发现这追问无法穷尽。

遇到了，撞上了，经历了，看到了，想到了；疼过、痛过、悔过、爱过，自然而然，我想到了自己的作家职业。我相信我对此比别人看到的更多，想到的更多，经历的更多。而且，此类人群和题材，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基本是空白。这空白是一种缺憾。而让我填补这空白，我以为是上天的安排。

写或不写，我曾长时间颇费踌躇。最难过的是儿子和写作体裁两道关。写成长篇小说，一切都是虚构，儿子妻子和我，似乎可以与小说中的人事撇清关系，所有的是非曲直、善恶美丑，与我们无关，儿子可以接受，写作顺利成书。但是，虚构的小说，客观地说，愿意掏钱买来看的人确是越来越少了，即便极少数人买了、看了，他们中仍然难免会有人误认为虚构等于虚假，而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和效果。说得极端、夸张一点，中国人民越来越不爱看书，尤其不爱看小说。以纪实加文学的形式呈现，当然是最佳选择了，但我首先要面对的是儿子，这既是一道难关，更是一道险关。如果我对儿子说，这本书主要是写你的故事，写你这段苦痛并“黑暗”的经历，而且是以纪实的形式真枪实弹地写，儿子会断然拒绝，此书问世基本无望；那么只有瞒，书出后造成既成事实，再与儿子“摊牌”，力争儿子的理解。其二，既然是写失误、写失败、写教训、写拯救，写反思反省，以及必有的忏悔与救赎，都绕不开家庭、个人的疼痛和诸多隐秘的、不愿为人道为人知、甚至会遭人诟病的“隐私”，这一条同样很煎熬人。

最终，我还是写了，以纪实的形式，写出了《一个孩子的战争》。完稿后，我内心少有的平静安宁，仿佛挣脱了绳缚锁锢，一身轻松。唯独存留于心的隐忧就是将来如何面对儿子，个性十足的儿子会作出什么反应，更担心出现不敢想象的反叛、反弹。这又让我和我妻子的心一直提着，揪着，一直悬到书出。

中国的教育话题太大，我只能从一个家庭的“解剖”入手，将书名的副题定为“家庭拯救纪实”。小家庭，然却是大话题，我希望从一个家庭辐射开去，读者的所思所感，将会是全方位的延伸。实际上这样的目的已然达到了。千万个家庭的拯救，岂非“社会拯救”的范畴？

写作前和写作中，我和特别教育学校的校长徐向洋一样，也曾想到过那个不无悲壮的名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结果是，我将妻子，特别是儿子，一起拖入了“地狱”。

借这书写内心的短章，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妻子不避“家丑”的勇气，我更要感谢我们的儿子，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磨难之后，在被迫为此书“献身”之后，在承受了三个月怕看此书的内心挣扎之后，在他母亲的生日那天，终于将书看完，并理解、体谅、原谅了我们，以一条让我们夫妻泪流满面的短信，与父母达成了最终的和解。我含泪感谢命运，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结局，将我们这个曾经苦难的三口之家带出了“地狱”，回到阳光灿烂的人间。

然而，在我未及尽幸尽欢的时候，却发现一个又一个孩子正在真正地、永远地进入了“地狱”。2012年4月7日，武汉市文联、武汉文学院联合武汉晚报为《一个孩子的战争》举办了研讨会，会前，我已得知武汉一所重点高中一名备战高考的高三男生，于3月28日下午突然冲出教室，从五楼跳楼身亡。就在研讨会前夕，一位浙江的读者弯弯妈妈给我发来邮件，嘉兴一中一位高三女生，仅仅因为今年3月的一次高考调考没考好，也跳楼自杀了。两位高三应届考生都死在莺飞草长的阳春三月。含苞欲放的生命，一个家庭只有“一个”的孩子，就这样，死了就死了，没有谁对这类死亡负责，留给父母亲人的是天塌地陷，生不如死。所以，我要在此写下儿子小学的母校武昌湖北省实验小学校长张基广，去年见诸报端的通栏标题粗黑字体的“名言”：教育就是学生今天睡好觉明天不跳楼。

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写。我为什么不写？我为什么不这样写！

■新作快评 南翔《绿皮车》
《人民文学》2012年第2期

城市寓言绿皮车

□欧阳德彬

许多时候，站在市中心的天桥上，却不知道路在哪里。桥下汹涌的车流来往穿梭，人行道上的路人也脚步匆匆，一望无际的是建筑的森林。飞机、地铁、高铁，人们可以随时出现在世界的任何一座城市。交通变得迅捷，乘客之间甚至连相视一笑的机会都没有，更谈不上分享一段经历，演绎一段故事。城市的扩张，集聚的不仅是人口，还有人情的疏离，破坏的不仅是环境，还有悠然的诗意。

那种“慢生活”常映现在独处的时光里，倚在老城墙的灰砖上，数着一缕一缕的冬阳，感受着一寸一寸的光阴。在边远的乡村，沐浴着黄昏时分的柔光，凝视着水漏上垂下的丝瓜。山涧里沐浴的女人，在水里追逐嬉戏，波纹一直荡漾到过客的心里。

近年来，绿皮车渐渐淡出城市的记忆。在作家南翔悠长回望的目光里，它承载着生命之慢，从岁月深处缓缓驶来，成为一则城市寓言。南翔虽然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文学教授，却绝不是那种只躲在书斋里的学究式人物。他孜孜不倦地穿梭在学院和民间，对文学艺术的追求立足于朴真人性和人文关怀，从细节中追溯着小人物的精神踪迹。这种不囿于教条的审美取向鲜活感人，在学院里显得格外遗世独立。我们可以从短篇小说《绿皮车》里窥其端倪，茶炉工、学生、鱼贩子、菜贩子、乞丐在绿皮车里相遇相知，演绎着芸芸众生相，散发着人性的温情。世俗常给成败带上财富和地位的烙印，但他们都是社会上的失败者吗？他们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却有情、有爱、有义、有生活的追求，这无疑给这个追求成功的时代带来另一种味道。“菜农们早上满担去，晚上空担回，利用回家的间歇，摸一把牌的有，打个盹的有，还有的，将一大把零票子摊在座位边，一五一十，窸窸窣窣地码好，龇牙咬下腕上一根橡皮筋，箍紧，便是油腻腻、硬邦邦、心思熨帖的一扎收获。”这样扎实、细腻、传神的细节描写，使菜农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过目不忘。当一个过度渲染英雄的时代被历史的风烟无情湮灭，世界回归真实：没有英雄，只有为生活奔波的众生，没有崇高，只有交织着善与恶的朴真人性。生活的真谛，也大概就隐藏在普通人的举手投足间。

茶炉工所兜售的，是列车段配发的“五颜六色的水、陈年的瓜子、看不清生产日期的火腿肠和尼龙袋装着的歪瓜裂枣。有时也配一些时兴玩意：通体会发彩光的手电、火烧不烂的袜子和号称戴三个疗程可以根治各种头痛的帽子”，这些物非所值的列车商品难免让读者心生嫌恶，但当“一双烧不烂的袜子耗去几乎一只打火机，依然摆回售货车”，又让读者体会到茶炉工的那份无奈，以及“他过去抹一把茶几，也无声地贴了一张五十的钞票在她书包里”，又可以体会到他的善良与无私。作家深深隐藏在文本的后面，口不臧否人物，而是以白描之法使情态毕现，勾勒出一个个立体鲜活的人物。绿皮车里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意象，却能一点一滴地留在读者的心中。

《绿皮车》是追挽之作，更是忧患之书。晃晃悠悠、老态龙钟的绿皮车，无疑是一则城市寓言，一种生活方式的指代。绿皮车（慢车）是一个流动的茶馆，汇聚了芸芸众生相，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隐喻——联想到我们“高歌猛进”的过去和当下，“慢”下来，才有低徊，检讨、左顾右盼，乃至扶老携幼，荣辱与共……当生命不能承受之快困扰着我们的心灵，我们是不是该慢下来，聆听花开的声音，瞩目飘落的秋叶呢？

■短 评

“乡土诗”的新收获

□樊 星

勤奋笔耕的田禾寄来了他的新诗集《在回家的路上》。读着读着，那些真切记录了诗人苦难记忆的作品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和诗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谈起苦难往事时痛彻心腑的神情——他对于苦难的耿耿难忘、他在讲述苦难时的声嘶力竭，都使他在当代“乡土诗”人中凸显出他的个性。如果说，当代“乡土诗”大致可以分为“清新一派”（如管用和、饶庆年的诗歌）与“咏叹一派”（以叶延滨的《干妈》为代表），那么，田禾的特点则在一个“喊”字。他的代表作《喊故乡》就具有强大的震撼力——那不仅是游子思念故乡的呐喊，也是诗人为故乡的苦难大声疾呼的泣血之声！是的，这是一个大声疾呼的时代，在各种声音的大声喧哗中，诗人也必须大声疾呼才能引起人们对于苦难的关注。

不错，改革开放已经为许多乡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这抹不去诗人的苦难记忆。诗人在描写自己的苦难记忆时，常常能够寥寥几笔，就画出贫苦农民的沉重生存状态来。例如这样的句子：“父亲弯腰捡回了／丢失在路边的每一棵麦穗。这些麦子／成了我们日后度饥荒惟一的口粮”（《那时候，我还小》），还有：“她拎着半框红薯回家／佝偻的身体几乎埋进了筐里”（《刨红薯的老人》）。令我过目不忘的还有那首《柴火灶》——这堪称是乡村最典型的生活场景。诗开篇一句“我不叫它柴禾灶，我喊它娘亲”就使“柴火灶”与“娘亲”的形象叠映在一起，写活了复杂情愫的交织——乡村的朴素、辛劳与亲切，如烟火气一样混合在一起。时而，“柴火烟立刻在／灶屋里缠绕，像娘穿上了一件灰衣裳。／火焰是她的笑容……”，时而，“从来享受不到阳光、雨露，她／无怨，也无悔。生活简单，一双／生锈的铁筷，喂给她干枯又粗糙的／草根、豆萁……”如此写人如其灶，灶似其人，可谓立意新颖，诗思独运，堪称佳构。乡村有苦难、也有乡村独有的温馨。田禾在《柴火灶》中融入了非常复杂的情感，读来耐人寻味。他好像正在远离“喊”？

如此看来，诗人在“喊”之余，是在向着新的高度挺进了。喊过以后，是锐意求新，是开掘乡村生活的浑厚底蕴，是进一步挖掘诗歌的表现力。像《拉二胡的民工》写诗人“悄悄站到那群民工的背后”，听那位民工拉快节奏的《赛马》，不用咏叹，也使人感到五味俱全；还有《民工王四虎》，写民工默默清污的艰苦与被“黄头发妇女”（也许是不小心地）兜头浇半桶尿的窝囊，也不用褒贬，读后令人生出无限感慨；还有《天越来越冷》，回忆儿时过冬的场景：全家人围在“蔸子火旁边”，“我与弟弟做游戏／母亲补衣裳／父亲和四叔／把火头上的一壶酒喝完了”，也呈现出朴素、温馨又略带苦涩的烟火气息……“喊”过以后，诗人在“静观”与“回忆”中还原了生活的原汁原味。一切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从真情出发，直至永恒

——读董培伦诗集《情归何处》

□孙 侃

讨论董培伦的诗作，必定要与“爱情”这两个滚烫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这位情感极其细腻的诗人，第一次提笔写诗，就选择了这一玫瑰色的永恒题材。然而，在董培伦新近出版的诗集《情归何处》中，爱情诗这一主题有所淡化，他所叙写的触角恣意地延伸开来，延伸至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近年来发生的国内外大事、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现实问题，以及京杭大运河、新疆天山、故乡山东、欧洲风情，自然还不少了挚爱亲情。可以说，在我读到的董培伦的诗集中，这部诗集题材广泛，几乎记录了这几年他的行踪、他的关注重点、他的内心思索，其自如挥洒、别具一格的写法前所未有。与之匹配的是，这部诗集手法纯熟，句式凝练，意象纷呈，音韵和谐，既保留了明快、晓畅、奔放的风格，又强化了内容旨意，使每篇诗作更显深刻。深刻、率直、尖锐，是这部诗集叙写现实时的鲜明特色，那些直抒胸臆的句子尽管不乏诗人的急躁，却饱含了不沾纤尘的真诚和希冀。。

我特别喜欢历史或现实题材的《是谁融解了大冰雪》《一位溺水的打工少年》《龙井茶的呼唤》《在宁波天一阁藏书楼观范钦先生画像》，描述人文遗存和各地景色的《是谁的牙齿将广济桥啃食》《孔雀河是怎么蓝起来的》《达坂城的姑娘哪去了》《圣人山》等作品，每一篇都值得反复吟哦。“圣人山在天山与昆仑山之间/显得比沙粒还要渺小/但在热爱知识的维民心中/它比珠穆朗玛峰还要崇高。”（《圣人山》），这样的诗句，在技巧上似已朴素到了极致，但这朴素藏在了至真和恢宏之中，反复揣摩，用心领悟，便知其渗入每个文字中的感情和技法，表达得炉火纯青。类似的阅读感受，在细读董培伦那组题为“亲情萦怀”的诗作时，会愈发强烈。“回乡看望双亲的路坎坷而又漫长/旅途的困倦令我睡在老父亲身旁/尽管12岁时我就远离他的呵护/年近古稀还是他膝下的儿郎。”（《老父亲的手》）这是这首诗的开头部分，深味再三，不得不确信除了这样剔除多余技巧、突显情感本真的写法是最适合、最能准确表达内心的。而在“喜看欧洲”这一辑中“卢浮宫内三件镇馆之宝”的三首诗：《胜利女神》《蒙娜丽莎》《维纳斯》，充分展现了董培伦擅于描摹、情融于景的写作风格。三件镇馆都是女性形象，却分别展露出英勇、从容和柔美这三种特质。我相信站在她们面前的那一刻，是诗人此番游历欧洲的高潮，以他的诗句为证：“五百年前的一张油画/是达·芬奇的传世经典/无论我怎样变换方位/都逃不脱她温柔的顾盼。”（《蒙娜丽莎》）依然是不吝激情的表白，依然掩不住对阴柔女性的赞美，爱情诗人在极度的美轮美奂面前，免不了些许失控，这便是诗意喷涌的泉口。在那里，滚烫的熔岩能烧毁理智的羁绊，剩下的便只是五体投地的钦服和神赐的妙句了。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理解，即便董培伦的叙写对象有了一定的转换，但其风格尤其是作为其创作动力的激情却一如既往。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说过：“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源于宁静中积累起来的情感。”然而，推动董培伦投身诗歌创作且无法自拔的原因，除了宁静中积累起来的情感，还有思索、迷惘、无奈和痛苦。当他暂时从至上的爱情中抽身回望四周时，发现历史和现实题材俯首可拾，这既让他仿佛打开一座金矿般兴奋，又不得不为沉重的历史和严酷的现实伤神。这部《情归何处》，是董培伦30多年来除了爱情体验之外的其他人生经历和体验的集大成，内中可窥见若干行状尤其是心路历程。毫无疑问，这一点他是通过这部诗集做到了，且做到极为圆满。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话题却被勾引而出：对于一向忠实于爱情表达的诗人，这样的蜕变会不会带来固有阵地的失守，或者说，战线的拉长会不会使诗人疲于奔命？因为，直到现在，我们最期待最渴望的，依然是尽显董培伦创作个性的爱情诗。

事实上，这几年的董培伦除了专事诗歌创作，偶或也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发表他所认定的诗艺观点。他力除新诗“散文化”的弊端，觉得如此便有碍于中国传统诗歌的继承，有碍于新诗的健康发展。他反复强调新诗的晓畅明快，反对晦涩难懂、佶屈聱牙，但同时也反对把新诗散文化，因为过分的口语化会导致诗意的失落，变成分行的散文，甚至连分行散文都不如的东西。这几年，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也践行自己所持的诗艺观，使理论与实践相融相彰，窃以为这部《情归何处》即是这一动机推动下的成果之一。从真情出发，直至永恒。我钦服于董培伦的诗艺观，更钦服于他矢志于坚守诗歌应有阵地的倔强姿态，当然，我也钦服于他近年来所获得的骄人成就。